

中 | 华 | 经 | 典 | 名 | 著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诗 经

刘毓庆 李蹊 译注

【上】

国 风

中华书局



中华
经典
名著
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刘毓庆 李蹊◎译注

诗经

国风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经/刘毓庆,李蹊译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1.3

(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)

ISBN 978-7-101-07738-4

I. 诗… II. 刘… III. ①古体诗-中国-
春秋时代②诗经-译文③诗经-注释 IV. I22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34099 号

书 名 诗 经(全二册)

译 注 者 刘毓庆 李 蹊

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责任编辑 宋凤娣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29½ 字数 650 千字

印 数 1-8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7738-4

定 价 54.00 元

新
知
识
PDG

前 言

一 关于《诗经》的性质及其结集问题

阅读或研究《诗经》，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“《诗经》是一部什么书”。今天，无论哪一部文学史，都会明确地告诉你，《诗经》是周代的一部诗歌总集。并且告诉你，只有以文学的眼光来研究《诗经》，《诗经》才算是恢复了其本来面目。但是要知道，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，《诗经》却是以“经”的绝对权威存在于中国历史的。她的经学意义要远大于她的文学意义，她对中国文化史的巨大影响主要在“经”而不在“诗”。如果我们简单的仅仅以“文学”来对待，她的文化意义必然要受到巨大损伤。因而我们必然面对历史与现实，对她作出客观的分析、认识与重估。

就从《诗经》的产生而言，虽然她的每一篇其本质都是文学的，然而她的结集，她的权威性与神圣性的出现，她的广泛影响，却是与周代礼乐制度密切联系着的。她不仅表现了周代礼乐制度笼罩下的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，表现了礼乐文明即“周代理性精神”激荡下人们的种种思考和心灵感受，同时她是作为礼乐文明的一部分而产生、而存在的，她的各篇诗歌，都是配合着“周礼”而演唱或演奏的。在什么样的场合演奏什么样的诗，这是不能含糊的。在大学，作为学习《诗经》的一般知识必须要知道的是：“《诗经》收录了自商末（或说周初）到春秋中叶的诗歌

305篇,存目311篇,其中六篇有目无辞。共分风、雅、颂三部。其中《风》诗分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、《王》、《郑》、《齐》、《魏》、《唐》、《秦》、《陈》、《桧》、《曹》、《豳》等十五国风,有诗160篇。《雅》分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,有诗105篇。《颂》分《周》、《鲁》、《商》三颂,有诗40篇。《诗经》诗篇所产生的地域,大略在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,及湖北、安徽北部等地。其作者成分很复杂,有民间歌手,也有文人之作;作者的身份有帝王和朝廷重臣,也有宦官、走卒和农夫、农妇。然而时间跨度如此之长,地域分布如此之广,在人类物质财富尝不发达、靠竹简艰难地记录语言的时代(在当时抄录一部《诗经》所耗财力、人力,必然是很大的),如果不是礼乐制度的需要,不是出于政治功利目的,我们很难想象,有人会为一部“纯文学”的集子、为简单的情感抒泄,去耗费大量人力、财力进行一项对国计民生没有意义的工程的。因而我们说,《诗经》一开始就不是作为文学启动的。

据有关史料记载和古今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,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《诗经》的结集过程:周代有“采诗”之制:每年在固定的时间内,有专人到各地采集歌谣,集中上报到周王朝中央管理音乐的官员那里,经过王朝乐师的整理(乐谱和歌词大约都有修改),再献给天子,目的是为了“观民风,知得失,自考正”。这部分诗大部分在《国风》中。另外的《雅》诗有许多为朝廷官员的“献诗”,即《国语·周语上》所说的:“古者天子听政,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。”至于编辑过程,大约有三次,第一次编辑当在周宣王时,第二次当在平王东迁后,第三次是孔子最后整理编定(参见刘毓庆、郭万金《诗经结集历程之研究》,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)。这三次编辑的时间相去甚远,但编辑的主导思想都是为了“崇礼乐”,稳定政治统治与社会生活。特别是孔子编诗,其意义更为巨大。

《诗经》是周代礼乐文化即华夏传统文化最可靠的载体。而春秋时代礼乐崩坏,四夷交侵,使这一文化面临空前危机。孔子编《诗》实际上承担着两项文化使命,一是“文化复兴”,二是“文化承传”。他通过删述

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建立起了中国经典文化体系和文化学统，使得中国文化万代相传。无论哪个民族，要想入主中国，首先必须接受这个经典文化体系。“能行中国之道”，方有资格“为中国之主”。而一旦其行了“中国之道”，其民族便会部分的失去“自我”，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。中华文化历经劫难而不灭，奥秘正于此。因此可以说，没有《诗》、《书》经典文化体系与文化学统，就没有今日的中华传统文化，也就没有中华民族。

《诗经》有如此巨大的意义，岂是“诗歌总集”所能承载！

二 历代《诗经》研究情况述略

关于《诗经》的研究，其主流也是“经”的研究，这从《诗经》结集的那个年代就开始了。我们可以简单地划为七个时期：

第一个时期是先秦，这是“诗经学”的发生时期，此时出现了从训诂角度研究的《尔雅》与阐发诗义的《诗传》（见《荀子》引），而最重要的则是今天所见到的《毛诗序》。20世纪《诗》学界普遍认为《毛诗序》是汉代人的作品，而近些年由于地下出土的文献旁证，许多学者倾向于《毛诗序》为先秦旧籍说。《毛诗序》提出了不少重大课题，成为后来《诗经》研究者争论不休的问题。其中最主要的是“风”、“赋”、“比”、“兴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“六义”的问题，这成了研究《诗经》需要了解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。现在一般都采用孔颖达和朱熹的说法，即“三体三用”说。“三体”指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三种诗歌体裁，就是《诗经》中所分的三大类。读者可阅读本书各部分的说明，此处不作赘述。“三用”指“赋”、“比”、“兴”三种创作方法。从字面上理解，“赋”铺陈其事而直述之，“比”是比喻，“兴”是托物起兴。但在具体诗篇的理解中，是属比还是兴，各家就见仁见智了。

第二时期是两汉，这是“诗经学”的确立与鼎盛时期。这个时期传诗者主要有齐、韩、鲁、毛四家，前三家在汉武帝时即被立于学官，介入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建造，属于今文学派，毛诗因后出，未能立于学官，长

期在民间传播。四家《诗》的学者共同努力，将《诗经》经典化、神圣化、政治化、历史化，创造了一个经学的时代。各家都有不少著述，而今传于世的只有毛亨、毛萇所撰的《毛诗故训传》（简称《毛传》）与郑玄为《毛传》所作的《毛诗传笺》（简称《郑笺》），今传世的《毛诗传笺》也就包括了《毛传》和《郑笺》，这被学者们认作是“诗经学”的第一个里程碑。

第三个时期是魏晋至唐，这是个经学中衰的时期。这个时期的“诗经学”，很少创造，惟有诠释旧注。这时最流行也最权威的《诗》著作就是《毛传》与《郑笺》。许多人在到底毛、郑谁更准确地把握住了“毛诗”的精神问题上争辩。出现了《毛诗驳议》、《毛诗问难》、《毛诗笺传是非》、《毛诗异同评》等之类的著作名目。到唐由孔颖达奉敕编撰的《毛诗正义》（又称《毛诗注疏》，简称《孔疏》）产生，这才调停了纷争。这部书代表了这个时代最高成就。但严格地说，《毛诗正义》不是在注“经”，而是对“经”之注（即《毛传》和《郑笺》）的阐释。

第四个时期是中唐以后至宋、元，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是《毛诗序》被怀疑，经学开始向义理化方向转移。从中唐韩愈即开始“疑序”，经宋欧阳修、苏辙等，到郑樵、王质等发展到顶峰，将《诗序》彻底否定。朱熹《诗经集传》（简称《诗集传》或《朱传》）则在宋儒研究的基础上，以平和之气，弃序不用，就诗论诗，酌采毛、郑，以意逆志，多得风人之旨，代表了宋代“诗经学”的最高成就。其后南宋与元代的《诗经》学，其实多数是对朱熹诗学的诠释和发挥。不过与魏晋隋唐人用“字释句解”的方式诠释《毛诗传笺》者不同，宋元人诠释“朱传”，主要是从义理上阐发，从整体上把握它的意义。

第五个时期是明代。明代从整体上看也是一个“述朱”的时代，但到明代后期发生很大的变化，此时“诗经学”最大的特点是，用文学的眼光研究读《诗经》，产生了一批《诗经》文学研究的著作，最有代表性的是孙钊的《批评诗经》、徐光启的《诗经六帖讲意》、戴君恩的《读风臆评》等。这一批著作的出现，开辟了《诗经》学新的研究方向。

第六个时期是清代,这是《诗经》考据学的鼎盛时代。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胡承珙《毛诗后笺》、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、陈奂《诗毛诗传疏》、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以及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、俞樾《群经平议》等一批训诂与考据的著作。为此后“诗经学”的健康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。他们的研究成果,特别是文字训诂方面的成果,至今仍被大量采用。

第七个时期是20世纪,这是现代“诗经学”生成的时代。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点是:抛弃了以往“经”的观念,把《诗经》纯作为古代文化遗产来对待,从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民俗、语言、文化学等多个角度,对《诗经》展开了研究,并且由传统单一的经注模式,转向了纵横论辩的论著模式。像顾颉刚、郭沫若、闻一多、郑振铎等一批大家,都曾以摧枯拉朽之势,给旧《诗》学以颠覆性的冲击,并以崭新的观点,启迪着一代学人。这个时代的最大贡献,被学者称作是:揭去了旧经学堆积的层层“瓦砾”,还《诗》以本来的面貌。

然而《诗经》的研究,是否确如20世纪学者所认为,是“今是而昨非”呢?

三 20世纪《诗经》研究的偏失

确实,20世纪在一批优秀学者的努力下,《诗经》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。综合研究与深入探讨问题的论著,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时代。但同时《诗经》研究也出现了偏失。

第一个偏失是,否定了《诗经》之为“经”,也彻底否定了“旧经学”,但自己却掉进了“新经学”的泥淖。就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而言,几乎没有一个文化人不诵读《诗经》的。面对《诗经》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,一种是通过学习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,一种是研究其中所蕴有的意义。后者的行为产生了大批可供后人继续研究的思想性、学术性著作,是属于经学的。而前者,则或见诸于行为表现,或形之于诗文与艺术创

作,是属于文学的。但即使对诗文及艺术创作的影响,大半也是因为她作为“经”的绝高地位所致。即如鲁迅所说:假如现在有人写出“关关雎鸠”那样的诗去投稿,定会被编辑扔进纸篓的。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,也就是说,无论用哪一种方式阅读、接受《诗经》,都无法摆脱《诗经》作为“经”的巨大影响,她作为一种文化精神,已融化于传统中国人的学术思想、文学艺术创作、行为表现之中。每个时代的人对《诗经》的理解、阐释、接受,都体现着每一个时代文化主流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。20 世纪的《诗经》研究者声称颠覆传统、开辟了《诗经》研究的新时代。但请想一想:在 20 世纪前半叶,“个性解放”的呼声高涨之际,学者们一时把目光放到了《诗经》中的两性关系的表现上,发掘出了一批所谓赤裸裸的表现性生活与感受的作品,以此而高扬性的合理性,从而使《诗经》“婚恋”诗的研究成为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成果。五、六十年代在“阶级斗争”理论风靡一时之际,《诗经》于是变成了最早体现“阶级斗争”的教材。八、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热兴起,《诗经》于是又成了文化的百科全书。难道这种从《诗经》中为现行社会思潮或政治行为寻找理论根据的研究方法,不正是“经学”的新形态吗?

第二个偏失是,既然把《诗经》认作是纯文学作品,于是便用 20 世纪的文学观念来研究《诗经》。而 20 世纪从西方引进的某种“统一”的文学观念,将文学的价值认定在了“反映生活”上,于是《诗经》研究者便配合社会的政治与文化思潮,来研究《诗经》中的婚恋生活、妇女生活、阶级斗争生活,甚至从《诗经》中寻找“奴隶社会”或“农民起义”的影子。把一部《诗经》认作了是周代社会生活的镜子,不但否定了《诗经》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,也忽略了其作为文学展示人类心灵世界的意义。

简单地说,如果本着 20 世纪的《诗》学观念与思路继续前行,其结果:第一、可能会把大批前人的《诗》学著作认作是“思想垃圾”而予以抛弃;第二、可能会将《诗经》的文学研究认作是本体研究,而将其他研究视为另类或“前文学”研究;第三、可能会把《诗经》与后世的诗文小说放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（<https://www.shgis.cn>）

文档名称：《诗经（上）国风》刘毓庆，李蹊译注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756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